

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周水涛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100)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末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分蘖为一种文体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有着明显的标志物。文体成熟的内在标志物是:在政治、历史、文化等三大领域内确立了特定的叙事板块,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独特的主旨。文体成熟的外在标志物是:小城镇叙事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的深化,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学界忽视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文体成型。

关键词:小城镇叙事;文体形态;文学类型;标志物;小说亚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2-0156-07

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和叙事平台的小说类型。它既不同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依托于某种文学思潮而具有时尚特征的小说,也不同于“身体写作”、“成长小说”等具有某种特殊“写作倾向”的小说,也不同于知青小说等依托某种特定题材进行创作的小说,而是一种经历了几十年的发育过程而最终具备稳定文体特征的小说类型。独特的叙事内容、意象系统与叙事方式,将这一小说类型与一般小说区别开来。其基本文体特征是:主要描写小城镇生活与人生,演绎小城镇发展史、演变史,小城镇既是被审视、被把玩的对象,又是承载作家的生活阐释与历史思考的平台或意象;当小城镇作为一种平台或叙事能指时,它既以其特有的物理属性与文化属性昭示“乡土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质变与量变,又以其自身发展的线性轨迹标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在“现代化”阶段的演进史。师陀《果园城记》、沈从文《边城》等在20世纪上半叶问世的作品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起点。师陀在《果园城记》中力图展现“乡土”和“现代”的矛盾,把“果园城”这一平台置于“孤独叙事”中,进而论证“处于这种时空中的果园城不能不孤独,而对乡土风俗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它却能通过自身的封闭、自身的孤独去避免,因此它将更加封闭,更加孤独”^[1]。沈从文构筑的“边城”实际上是呼唤“乡土”精神文明的平台,“通过‘边城’这个小小的舞台,来表现生命的自然本真状态”^[2]。在过去几十年中,小城镇叙事小说这一小说亚类经历了萌发、休眠、复苏、发展、成型等节点。谢越华等认为:“一种较成熟的文类都有较为稳定的文体形态,都有自己独特的组合原则和外在特征。反之便是范畴模糊,体例不纯,是文体不成熟的表现。”^[3]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90年代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这就意味着文体的成熟。当今,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红红火火,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然而,学界忽略了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文体”在此特指文学体裁(Type of Writing)而不是文学风格(Literary Style)。学界目前对小城镇叙事的文体归属认定有三种:一是将小城镇叙事等同于“身体写作”等依托某种创作时尚或潮

* 收稿日期:2013-07-18

作者简介:周水涛,文学博士,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08BZW063),项目负责人:周水涛。

流的“一过性”创作,在研究中不存在文体归属认定问题,如余连祥在研究鲁迅小说的“小城镇叙事”时,认为小城镇叙事从来如此,其来龙去脉无须多言^[4];二是不对小城镇叙事进行周密定义,回避文体归属的讨论,直接使用“小城镇文学”概念,如赵冬梅说“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有着众多的以小城镇为故事背景的作品”,随之自由地使用“小城镇文学”、“小城文学”等概念^[5];三是对小城镇叙事进行定义,但悬置小城镇叙事的文体属性认定,如熊家良对“小城文学”进行了周密而精准的定义,但搁置了“小城文学”属性与归属的认定^[6]。上述三种文体归属认定方式,导致研究方法上的两种偏颇:一是只考察“流”而不问“源”,笼统地在不同共时平面上撷取研究标本,进行“汇总研究”,而放弃对其进行线性梳理与历时考察,对不同时代作品的差异或单个作家整体创作的概况不管不问;二是问“树”不问“林”,忽视对小城镇叙事的整体把握,拿着自己认定的标准,按图索骥地框范单个独立的标本,只要涉及小城镇描写就将其认定为小城镇叙事作品,继而综合众多单个独立作品的共同之处展开研究。由于小城镇叙事的文体属性与归属未曾进入研究者视野,其文体发育研究受到极大遮蔽。学界的偏颇与忽略,是讨论小城镇叙事小说发育与成熟的动因之一。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成熟的文体都具有对自身文体属性或形态进行提示的标志物,小城镇叙事小说也不例外。本文从两个层面对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标志物进行识别和解读,从而说明这一小说亚类的文体成熟。

一、从内部标志物看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成熟

“内部标志物”在此指对文体属性或形态进行直接标识或提示的参照物或指标,亦即关联文体内在属性的参照点。

(一) 特定的叙述内容

认定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成熟的依据之一是,到90年代末,小城镇叙事小说开始具有相对固定的叙述内容。生活千姿百态,作家喜好各不相同,但某种小说亚类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叙事范围,一种在一定历史时段内持续发育的文体,如果开始具有相对固定的书写内容,那么就意味着这种文体已经成型或成熟。例如,“乡土小说”于20年代初萌发,时至20年代末,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一大批“旅居都市”的作家忆写自己的乡村见闻,当“故乡农村的生活”成为相对固定的小说叙述内容时,人们认定一个新的小说类型已经出现,于是,鲁迅提出了“乡土小说”这一概念。从宏观角度看,时至90年代末,小城镇叙事小说在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确立了自己的核心叙事板块,出于讨论的方便,本文称之为政治叙事、历史叙事、文化叙事。

政治叙事侧重于从政治学角度审视小城镇,对“当下”小城镇政权的审视是政治叙事的重心,如审视小城镇的权力运作,观照小城镇官本位意识、揭示小城镇政治文化的属性等。何申、彭瑞高、陈世旭、孙方友、张继、王新军、王祥夫、毕四海、向本贵、谭文峰等作家都有自己观照小城镇政权的系列作品,刘醒龙、阎连科、关仁山、阿宁、李佩甫、刘玉堂、田东照、薛友津、陈良、林和平、陈玉龙、叶明山、阎刚、侯发山、相裕亭、王渊平等作家也有审视当下小城镇政权的力作。阿宁《无根令》、陈良《中国乡官》、刘醒龙《分享艰难》、阎刚《乡选》、王渊平《乡镇干部》等作品,或观照小城镇政权的权力结构,或展示小城镇政权的艰难运作,或观照政府官员在小城镇这一特定空间内的生存境况,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其中,有些作品细致而深刻地展示了当代小城镇的官场文化,如周大新《向上的台阶》、刘玉堂《县城意识》、李佩甫《败节草》等,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小城镇的官场生态、酒桌文化与官场生存哲学等。

历史叙事既讲述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史与生存史,又以小城镇为叙事平台展示历史风云,反思历史,解构历史,把玩或调侃历史。历史叙事的时段重心是“现代史”和“当代史”。汪曾祺、林斤澜等老一辈作家的历史叙事侧重于“现代史”,鲁敏、魏微、薛舒、钟求是、徐则臣等年轻作家的历史叙事偏重于“当代史”,孙方友、陈世旭、刘醒龙、贾兴安等年岁稍长的作家的历史叙事则纵跨“现当代”。《你是一条河》、《李芙蓉年谱》、《镇长》、《阖闾镇沿革》、《打手》、《雷老坤》、《刘老克》、《圣天门口》、《镜中姐妹》、《大老郑的女人》等都是历史叙事的代表作。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并未将“城镇”作

为审视对象,更多的是在呈现一个叙事背景,其作品不能纳入小城镇叙事的范畴,但具备历史叙事的诸多特征。他们尽管在“‘史诗性’”这一点上有不同的写作倾向,但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回避,转而深入“民间”^[7]。小城镇叙事的历史叙事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叙事”,和“革命历史小说”的“红色历史叙事”有明显不同。《阖岚镇沿革》、《圣天门口》及陈世旭的“将军镇系列”等小城镇历史叙事作品,具有与《故乡天下黄花》、《相会在K市》、《半边营》等“新历史主义小说”相似的叙事行为,如解构“大历史”、颠覆“元话语”等,而在核心叙事指向上,二者有明确的分界线。《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终极指向与目的,是消解关联“元话语”的“大写历史”和建构“个性化”的“小历史”;《阖岚镇沿革》等作品无论是立足于小城镇历史而评判社会历史,还是以小城镇历史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其“历史叙事”都紧扣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史。小城镇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也不同:“历史小说”的历史讲述以宏大的历史时空为直接表述对象,而小城镇叙事的历史叙事则以叙述小城镇的变迁史及小城镇居民的凡俗生存史为主,部分作品立足于小城镇而观照天下社会,间接展示时代风云。小城镇“历史叙事”与“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讲述指向不同,对待“革命史”的态度不一样:“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指向是证明良好现实社会秩序与“革命史”的因果关联及现有政治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对革命或革命历史进行颂扬与赞美;小城镇叙事的“革命史”讲述始终密切关联小城镇自身的变迁史与生存史,对“革命史”持审慎态度,部分作品甚至以调侃、戏谑的态度对待“革命史”^[8]。

文化叙事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的文化审视、文化观照、文化考察、文化透视、文化批判等叙事行为。对小城镇社会群体的文化观照和对小城镇风情风物的展示,是文化叙事的核心内容。文化观照主要表现为审视工商业者、文人、官人、“闲人”等小城镇文化群体的构成及其各自的文化禀赋,工商业者群体与“闲人”群体是作家们描写的重点,汪曾祺、孙方友等作家是描写这两大群体的代表。小城镇风情风物的展示主要表现为描写小城镇世风民情、风光景物、风俗物产和民间技艺。传统手工业积淀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与久远的农耕文化质素,因此,榨匠、皮匠、铜漏匠、染匠、篾匠、石匠、罗匠、裁缝、剃头匠等手艺人的“绝活”成为小城镇叙事小说文化叙事经久不衰的话题,汪曾祺、孙方友、陈世旭、迟子建、张国擎、薛舒等众多作家都写了自己熟悉的手艺人。其中,孙方友的描写尤其引人注目:专门描写“颍河镇”和“陈州”的手艺人及传统手工业的小说多达几十篇,涉及几十种“职业”。

政治叙事、历史叙事、文化叙事等三大板块是新时期后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核心内容,其叙事内容的稳定性与集中性,与“现代文学”阶段小城镇叙事小说叙事内容的波动性、分散性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定,进入90年代之后,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趋于成型或成熟。

(二)特定的叙述方式

普遍意义上的小说不一定有特定的叙事方式,但某种小说亚类或亚种一定会有特定的叙事方式,就是这种特定的叙事方式决定了这一亚类或亚种的存在或成立。以交织着眷恋和批判的笔触,忆写故乡的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这一特殊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乡土小说”的存在。以抒情的“随笔”抒写自我经历、私密情感及隐秘心理,这一叙事方式使“身边小说”这一文体得以成立。进入90年代之后,小城镇叙事小说开始拥有特定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两种基本叙事模式,这是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

第一,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以表达独特的主旨。塑造人物形象以表达思想主题,是小说这一体裁的基本文体特征,但对小城镇叙事小说而言,人物形象塑造有着特殊的意义。小城镇是介于大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物理空间,具有不同于大都市与乡村的社会属性,小城镇社区成员的人格禀赋与都市人格及乡村人格差异明显,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又使这种差异日趋加大。从整体上看,作家们笔下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比“乡下人”少了几分乡土性、农耕性、狭隘性,但在开放性、现代性、开拓性等方面又不及“都市人”,局域性、事本性、内敛性、“灵活性”是许多“小镇人”或“小城人”的基本禀赋。因此,小城镇人物形象有着特殊的叙事功能,反映特定现实,揭示小城镇凡

俗生活,展示小城镇文化及小城镇人格,缅怀已经消失的传统生活,成为一般的叙事行为。汪曾祺刻画了药店相公、饭店小二、米店老板、小摊贩、剃头佬、接生婆、车匠、锡匠、挑夫、更夫、地保、屠户等形形色色且有着特殊文化人格的“小城人”,以表达文化的感伤与时代的追忆。孙方友以“人物传记”方式塑造了马老四、殷老二、刘老克、方老太、毛孩儿、雷公安、钱学孔、郑乡长、刘大肚子、关学亮、马六等几百个打上了鲜明小镇人格印记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塑造,其“笔记体小说”把玩了小镇人格,观照了小镇商业文化,展示了中原小镇风情风物。陈世旭对一段特殊历史的反思和对小镇人格、小镇文化心理的展示,主要通过李芙蓉、胡月兰、洪艺兵、痢痢镇长、殷道严、余自悦、艾老师等小镇人物的描写而实现。彭瑞高、何申、王新军、张继、薛友津、陈良等作家,主要通过形形色色的乡镇书记、乡长等人物的描写,展示了小镇官场文化,观照当下乡镇行政运作,反映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90 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出现了许多通过展示小城镇人格人性蜕变与发展进而观照小城镇自身变化与发展的作品,如《方老太》(孙方友)、《小镇风月》(宋唯唯)、《我那遥远的故乡小镇》(李骏)、《小城女人》(余小偶)、《小城男人》(余小偶)、《小城师爷》(少木森)等。例如,《小城女人》通过揭示“小城女人”既自卑又自信的心理特征,展示了小城知识女性既向往现代大都市又安于小城生活现状、爱慕虚荣、耽于幻想的“心理共性”。《小镇风月》通过小镇少妇玉霞躁动、出轨、回归家庭的经历,展示了小镇婚恋观、贞洁观及小镇传统生活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波动与嬗变。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以表达独特的主旨,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行为,而这种“有意识”正是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成熟的标志之一。

第二,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特定的主旨,如揭示时代风云与历史变迁,反思历史,反映现实,观照小镇凡俗人生等。进入 90 年代之后,为小镇“写史”成为时尚。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小城镇的主要叙事功能是充当一种叙事平台,而不是叙事对象。例如,贾兴安的《阖岚镇沿革》塑造了田家辉这一忍辱负重、深谋远虑、仁厚爱人的民间能人形象,演绎了 1913 至 2000 年这一历史时段内阖岚镇的生成史与发达史。作为一种叙事平台,作者“综合”了编年史与人物志两种叙事方式,以阖岚镇的变迁史映照整个时代的变迁,阖岚镇凡俗人生的展示与考量、权威元话语的内在逻辑,二者融为一体。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张国擎的《古柳泽》等具有史诗性特征的作品也采用了这种叙事模式。自然,这些作品也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但人物形象塑造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主旨,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古华的《芙蓉镇》是较早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叙事模式的作品。尽管作者的本意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9],但在“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之际,客观上展示了 1963 年、1964 年、1969 年、1978 年四个历史节点的政治风云,乡镇生活的变迁史与政治风云变幻融为一体。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主旨,从《芙蓉镇》的“无意为之”到《阖岚镇沿革》的“刻意为之”,这一渐进过程就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刻意为之”正是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成熟的标志。

二、从外部标志物看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成熟

“外部标志物”是指对文体形态进行间接“提示”的参照物或指标,这些标志物不是文体属性的直接外在表现,但能间接证明某种文体属性的存在。

(一)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

一种成熟或成型的分支文体必定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创作群体,致力于一种文体写作的作家群体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文体的形成。判断相对稳定“核心作家”群体的形成,有这样几个基本标志:这个群体必须由一定数量的作家个体或“代表作家”构成,持续产出具有相近文体特征的作品,拥有鲜明的文体特征,是某个创作类型的代表作。

小城镇叙事核心作家群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部分学者在 21 世纪初就达成共识或已经默认,“小城文学”或“小城镇小说”早在 30 年代即已成型,因此学者们都有自己心目中认定的代表作家,数量多达几十人。从熊家良开列的“独具意味的小城文学”代表作看,沈从文、废名、师

陀、鲁迅、茅盾、叶圣陶、柔石、沙汀、萧红、汪曾祺等是“小城文学”的代表作家^[6]；而赵冬梅认定的“小城小说”代表作家则是鲁迅、师陀、茅盾、叶圣陶、柔石、沙汀、萧红、王鲁彦、施蛰存、罗洪、王西彦等^[5]。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作家如鲁迅、茅盾、施蛰存等并非小城镇叙事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些作家如柔石、萧红、王鲁彦等不能列入“核心群体”。根据上文“基本标准”，可从两个方面审视现代文学阶段小城镇叙事的“代表作家”。首先，小城镇叙事小说“代表作家”人数极少。致力于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个体作家主要是京派作家，而考察其已有创作，仅能找出沈从文、师陀、废名、汪曾祺具有“代表作家”特征；除此之外，仅发现沙汀等极个别作家致力于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因此有理由认为，在“现代文学”阶段，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核心群体”并未形成，为数不多的几个“代表作家”不能称之为“群体”。偶尔写了一篇或几篇小城镇叙事小说的作家，不能看作致力于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将茅盾、王鲁彦、施蛰存等当作“代表作家”十分勉强。其次，要看“代表作家”产出的持续性及其文体特征的鲜明性。“持续产出”或创作的持续性包括两个标准，即产出的连续性与产出总量。笔者认为，在认定的“代表作家”范围内，师陀与沙汀的创作具有较明显的连续性，小城镇叙事小说总量在他们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较大，可称之为“核心代表作家”。而被人们认定为“核心代表作家”的沈从文产出持续性稍差一些，能称得上小城镇叙事小说的作品并不太多，《边城》、《长河》、《柏子》、《大城中的小事情》等可以看作是小城镇叙事的代表作，但这类作品在沈从文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不大；至于《旅店》、《丈夫》等作品，从创作指向角度看，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小城镇叙事小说，因为其文体特征介于乡村小说与小城镇叙事小说之间，从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掩映在乡村小说创作之中。在废名的创作中，像《浣衣母》之类具有典型小城镇叙事小说特征的作品很少，被人们反复称道的《桥》实际上写的是乡野与“镇郊”的“桃花源”，史家庄是农庄而不是城镇，“十年造桥”更是作家潜心构建的士大夫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与儒雅人生，而不是凡俗的小城镇世界，《河上柳》、《竹林的故事》的文体特征介于乡村小说与小城镇叙事小说之间，废名小城镇叙事小说在产出持续性、文体特征鲜明程度两方面都与师陀等人存在差距。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核心作家”群体阵营不大，产出持续性较好的“代表作家”为数不多，部分作品的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特征不太鲜明，可以认定在“现代文学”阶段，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尚未形成。

新中国建立之后，小城镇叙事一度休眠，新时期的到来则使小城镇叙事小说复苏。到90年代末，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城镇叙事小说作家群体基本形成，小城镇叙事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依据本文上述基本标准对核心作家群体进行考察。首先，90年代末出现了一大批长期致力于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一直将小城镇作为自己的叙述对象，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汪曾祺、林斤澜、陈世旭、孙方友、何申、彭瑞高、王新军、张继、毕四海、鲁敏、魏微、薛舒等不同年龄层次的作家，构成了小城镇叙事的核心作家。其次，这些作家有各自的系列作品，构成了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核心部分。例如，孙方友“小镇人物”、“陈州笔记”、“颍河人物”等系列小说多达几百篇（不包括《衙门口儿》、《紫石街》等涉及小城镇描写的长篇小说）；何申的小城镇叙事有“热河系列”与小城镇官场系列两大板块，前者包括《热河大兵》、《热河鸟人》、《热河官僚》、《热河傻妞》、《热河会首》、《热河儿郎》等，后者包括《穷县》、《穷乡》、《一县之长》、《乡长丁满贵》、《乡镇干部》、《女乡长》、《年前年后》等。陈世旭的“小镇系列”包括《镇长》、《将军镇》、《李芙蓉年谱》、《李八碗春秋》等中长篇，其中《将军镇》囊括了从《惊涛》、《镇长之死》到《圣人余自悦正传》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叙述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众多作家贡献了各自的“小城镇官场叙事系列”，如彭瑞高的《本乡有案》、《叫魂》、《秋天备忘录》、《六神有主》、《竞聘》、《理论科长》、《少白头》、《乡里老记》、《县长私人生活》，张继的《埋伏》、《黄坡秋景》、《乡选》、《买车》、《集资》、《一个乡长的来信》、《卖官》、《遍地羊群》，王新军的《好人王大业》、《远去的麦香》、《权力交易》、《遍地羊群》、《文化专干》、《乡长故事》、《乡干部下岗》、《落叶飞翔》，毕四海的《大官小官》、《选举》、《乡官大小也有场》、《“心理地形图”》、《第二官场》等等。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作品是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的重要板块。

总之,“核心作家”群体的庞大阵容、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的连续性以及“核心作家”各自的“系列作品”,是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外在标志。

(二)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

当具有某种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时,往往意味着某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或某种文学亚类文体的成熟或成型。考量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是否成型或成熟的标准之一,是以小城镇作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数量在当时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有多大。

直接描写小城镇的作品在整体创作中所占的比例是一个变量,直接揭示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发育的进程,而这个变量是由另一个变量决定的。在既定的发育阶段内,小城镇叙事在单个作品中所占比例的多少,决定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在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二者关系为“正相关”。因为小城镇叙事在单个作品中所占比例与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发育这二者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所以必须首先考察小城镇叙事在众多单个作品中所占比例的大小。

在80年代,除汪曾祺、林斤澜等极少数作家的创作外,小城镇叙事小说先后被不断更替的创作思潮和创作时尚所裹挟,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这个阶段内出现的许多小城镇叙事小说实质上是“准小城镇叙事作品”,如《小镇上的将军》、《芙蓉镇》、《腊月·正月》、《古船》等。在这些作品中,小城镇是重要的描写对象,但不是全部的描写对象,小城镇描写往往包容于其他描写之中。如《小镇上的将军》对小镇民风、小镇人格的观照,包容于对“文革”的反思之中。古华在创作《芙蓉镇》之初,虽然确立了“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思路,但事实上展示“政治风云”与“演乡镇生活”处于对等地位。在《古船》中,小镇本身仅是整体叙事的构成之一,因为对小镇文化人格及小镇宗法权力的审视与对早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文革”等不同历史阶段重要事件的反思及对“元话语”的质疑交融在一起。“准小城镇叙事作品”与《故里三陈》(汪曾祺)、《溪鳗》(林斤澜)、《小城无故事》(何立伟)等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没有本质区别,但存在量的差异,前者对小城镇的直接叙述远远少于后者。在80年代这一时段内,《大淖记事》、《徙》、《异秉》(改写版)、《三姊妹出嫁》、《岁寒三友》、《故里三陈》、《溪鳗》、《袁相舟》、《丫头她妈》、《小城无故事》等直接描写小城镇的作品所占比例极小,而“准小城镇叙事作品”是当时小城镇叙事小说的主要形态,这里所提示的信息,是小城镇叙事小说正处于发育之中。

进入90年代,小城镇叙事发育的最大特点是开始疏离主流意识或主流话语,疏离不断更替的文学主潮,逐步从“一般叙事”或改革文学等“特殊叙事”中剥离出来,小城镇叙事在单个作品中所占的比例与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在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这二者的“正相关”表现更加明显。小城镇叙事的独立性日益增大,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在小说创作整体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特征随之彰显。进入21世纪,将小城镇作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继续增多,创作总量在“共时总体创作”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可以通过对具体题材的考察来说明。先看描写小城镇历史变迁的题材。在80至90年代这一阶段内,从“史”的角度观照小城镇发展与嬗变的作品不多,进入21世纪后,这类作品迅速增加。如贾兴安《阖岚镇沿革》、刘醒龙《圣天门口》、张国擎《古柳泽》等具有史诗性特征的作品描绘了小城镇的“线性”发展,李骏《我那遥远的故乡小镇》、鲁敏《镜中姐妹》、周遵琴《小城家事》等展示了小城镇在新时期的变化与发展,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宋唯唯《小镇风月》、朱辉《穿着驴皮夹克的翔子》、曾楚桥《规矩》、与你同行《小城里风流韵事儿》等透视了小城镇在某一“共时平面”上的蜕变与发展。再看描写小城镇凡俗生活的题材。凡俗生活是90年代小城镇叙事的大宗,进入新世纪后这一题材的作品急剧增加。凡俗生活即“凡人”的世俗生活。新世纪小城镇叙事描写了小城镇世界不同阶层的风俗生活。“官人”的世俗生活仍是凡俗生活描写的主要内容,但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透视更深沉。部分作品彻底脱离“宏大叙事”,进入“官人”的“私人空间”与凡俗生存。如嘉男《小城秘密》写“工作狂”郝市长的夫妻关系及他对待女人的态度,少木森《小城师爷》塑造了当代“师爷”的形象。小城镇知识分子的凡俗生活是较新颖的描写内容,有着前所未有的丰富性。王方晨《金乡大儒》、王清平《守望官阶的女人》、陈大超《小城狂人》、《金

山》展示了小城镇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的世俗生存与世俗人生理想。底层平民或贫民的世俗人生是小城镇世俗生活描写的最大板块,孙方友承接汪曾祺的笔法,成为新世纪描写小城镇底层小人物生活的主要作家,其“小镇人物”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马老四》、《陈州烟火》、《殷老二和他的女人》、《吕家染坊》、《刘家果铺》、《刘老克》等上百篇作品展现了底层的人生百态,钟秀灵《小城人物》、陈大超《小城狂人》等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底层人物,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斑斓色彩。

90年代末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因此可以认定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在90年代末开始成型或成熟。在此有必要指出,将小城镇作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与将小城镇作为叙事背景的作品有着本质差异。将小城镇作为叙事背景的作品是指叙事关涉小城镇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小城镇不是叙事的指涉对象,而仅仅是事件的发生地点。如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原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远景。在杨争光的创作中,有许多事件发生在小镇上,但小镇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叙事背景,这些作品的最终指向是乡村而不是城镇。如在《棺材铺》中,杨明远导演了小镇上的暴力杀戮,其最终目的是要看到自己的棺材“怎样装人”,作品更多地是承续了《老旦是一棵树》、《赌徒》等作品对人性的探索及对西北农民命运与人格的观照。因此,《白鹿原》、《棺材铺》等作品与小城镇叙事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作品的存在与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演变没有密切关联。

三、余 论

事实上,作为一种经历了几十年发育而最终具备稳定文体特征的小说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发育及成熟,遵循着文体发育的一般规律。有两种规律性的“内驱力”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型或成熟。第一,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小城镇叙事的发展。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带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小城镇的扩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其“第三种社会”^[10]特征日趋明显,因而反映现实的小城镇叙事日趋红火,小城镇叙事的文体发育也随之加快。第二,叙事主体小城镇意识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叙事文体的成熟。小城镇意识是叙事主体对作为叙事对象的小城镇的特殊负载功能、意象功能、审美特征的认识,小城镇自身的发展使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日益深化、丰富,促进了小城镇叙事文体的成熟。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之际,小城镇既以其线性演进而标识自身的变迁轨迹,又以其相对静止而标志着其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位置,因而小城镇特有的时空属性赋予小城镇特定的叙事功能。从孙方友、陈世旭、何申、周大新等作家的“创作谈”看,作家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小城镇的特殊叙事功能,这正是作家们小城镇叙事意识深化的具体表现。小城镇叙事意识的深化与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成熟有着因果关系。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到90年代末,小城镇叙事小说已经具有稳定的文体特征,其文体形态趋于成熟,研究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发育与成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 [1] 常慧明.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21-25.
- [2] 胡灿. 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沈从文《边城》解读[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8-61.
- [3] 谢越华,陈剑晖. 文体变革与现代散文的发展[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5.
- [4] 余连祥. 鲁迅小说的小城镇叙事[J]. 鲁迅研究月刊,2011(7):21-28.
- [5] 赵冬梅. 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J]. 南都学坛,2004(2):55-57.
- [6] 熊家良. 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35-38.
- [7] 朱述超.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6-51.
- [8] 周水涛. 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章第4节.
- [9] 古华. 话说《芙蓉镇》[M]//芙蓉镇.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2.
- [10] 辛秋水. 小城镇:第三种社会[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5):55-57.